

一個缺席的口述歷史： 民進黨工人黨員徐凌雲和他的時代

吳永毅



戴著民進黨手錶的徐凌雲。

今年初秋月向徐凌雲邀稿，接電話的他太太，認為徐凌雲的狀況並不適合回憶往事。而我在寫胡美花的過程中想到徐凌雲，但是覺得沈重、難以下筆。不過本書編輯委員陳素香認為應該替最主要的領導人留下記錄，於是試著記下幾個片段，又因為涉及各種外力的定位，後來發展成一個歷史性的回顧。但關廠至今戰友團沒有條件探討這個敏感議題，徐凌雲本人又處於無法發言的狀態，我的初步觀察必然大膽、可供非議，它不代表工運團體或戰友團的立場，只希望提供往後討論的基礎。

從工人到政治人

2003年3月初，楊大華抽著煙，在外勞服務中心走廊，和我談起五年前見到徐凌雲的事：「有一天我去蘆洲的工地上工，經過蘆洲鄉公所門口，我先看見他，他也看到我，兩個都愣了一下，然後互相擁抱。他應該是正要走路回家吧！那裡距他家很近。他談到過去的事，腦筋很清楚，看起來也很正常，沒想到不久他就被送進精神病院了。」



徐凌雲人生中最燦爛的時光（右二為徐凌雲，左四為郭吉仁）。

不知道那是徐凌雲第幾次住院，但可以確定，1988年的抗爭使他第一次精神崩潰。之前，據曾慶鐘回憶❶，徐凌雲只有輕微的躁鬱症，偶而脾氣暴躁，他會吃藥。根據我讀過的精神醫學報導，重大打擊不是發病的主因，只是引爆心身裡其他致病因素的導火線。如果這是真的，如果沒有那場抗爭，徐凌雲心身裡的未爆彈，可能靜靜的陪他走完一生嗎？

徐凌雲和李重光是精紡同事，但他和楊大華有廠外的換帖交情❷。楊大華喜歡看黨外雜誌，從開始不

相信，和已經是黨外死忠的徐凌雲辯論，「辯久了，意見愈來愈一致。」每次黨外活動，徐凌雲一定找黨員好友廖耀松，和住在新光廠後方社區的大同工會傅雲貴（三人都是客家人）一起參加❸，屬跨廠場結盟的狂熱份子，徐是小團體的領袖，楊大華是支持者，林重謨應該是他們的「上級指導員」；又因為工廠隔壁就是謝長廷服務處，每逢選舉時他們成為謝長廷的椿腳❹。

下班後拿鋤頭的雞

關廠抗爭時，徐凌雲、傅雲貴、廖耀松等人一旦湊在一起，必定高談闊論起在某某街頭和鎮暴警察纏鬥的英勇事蹟，一如男人說起當兵軼事，百談不厭，不能停止。從88年10月往前推，他們應該參與了86年的民進黨成立、桃園機場許信良闖關事件，87年519的「反國安法、要解嚴」遊行、聲援台獨案蔡有全及許曹德、1225國會改選萬人擋火車事件；然後就是88年關廠前五個月的520農民運動。那天深夜，霹靂小組和數千鎮暴警察以中正一分局（舊址）為據點向外攻擊，群眾從不同巷道裡衝出來，丟擲磚塊、瓶罐和鐵條後又匆匆退回巷弄；警方數度折返，再以更優勢的警力重新推進；到了凌晨，還是記者的我，在現場目睹群眾開始焚燒公家車輛，警方則見人就打。曙光下的忠孝東路，像內戰廢墟，濃煙之後閃動的人影，肯定包括了徹夜未眠、但還要趕去上班的徐凌雲、傅雲貴。

王振寰引述學者對台灣反對運動分工研究，結論是：小資產階級（自雇者和中小企業）是金主、知識分子（律師、醫生、公職）是領導、下層勞動者則是選民⑤。所以不論投票或是街頭遊行，勞動者顯然是替民進黨菁英奪取政權的火牛。施明德在92年追憶詹益樺的短文〈鋤頭與鐮刀〉⑥裡比喻的更尖銳：「反對運動分兩種人，一種是拿鋤頭耕耘的人，另一種是拿鐮刀收割的人；嚴格地說拿鐮刀的人是因為以前拿

鋤頭，所以現在可以收割，但有些人卻是很明顯的從生到死，從參與運動到人生結束一直扮演著拿鋤頭的角色。」他指的是專職黨工詹益樺，但是民進黨內有更多像徐凌雲的業餘黨工，他們白天是受雇勞工，下班後成為民進黨的義務黨工。大同總廠工會的傅雲貴、張照碧和大同三峽廠工會的許守活、江清通就是典型代表，在88年，他們都是勞支會（勞工陣線）的死忠會員。

我想要把時間向前推的更遠，來說明徐凌雲和新光抗爭的歷史位置。1979年美麗島大逮捕後，黨外領導權被康寧祥為首的地方山頭所取代，激進知識分子的新生代，為了分享領導權，從82年起開始批康，83年進而組織了【編聯會】，並在84年催生了群衆路線掛帥的【新潮流系】，和它的外圍組織【勞工法律支援會（勞支會）】⑦。同年新潮流叢刊再發動了「雞兔問題」論戰，按照雞兔理論，走群眾運動、反體制路線的是雞，走議會選舉、妥協路線的是兔⑧。徐凌雲、傅雲貴當然是黨外的雞；按照現今的說法，則為「基本教義派」。

【新潮流】靠著這場論戰，在基層群眾中獲得支持而逐漸壯大，88年底士林廠關廠時，【新潮流】已經是民進黨內主要的派系之一，【勞支會】也是最活躍的工運團體了。比新潮流晚三年成立的跨派系的【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北基會）】⑨，更鮮明的標榜是基層黨工的互助團體，以協助在群眾運動中受司

阿花的土地公神像

事實上在徐凌雲之前，已經有人先崩潰了，那就是前紡的女工阿花，一個離群索居，以員工餐廳旁違建為家的中年婦人。她不識字、經常酗酒、臉上總是塗了胭脂，因此有很多對她不利的流言，說她曾經出賣身體，說她是女乩童、善作法、會邪術等等①。總之，她不太和人溝通，我們其實也不了解、不注意她，但她應該是支持自救會的吧，在餐廳開會員大會時，她總會坐在角落觀察？或是等待？不清楚。

十幾年來，員工餐廳牆上的土地公是她供奉的，每日上香、關廟後也未間斷。自救會在大門口阻擋半成品出貨，包圍卡車和司機及警察爭執，2003年四月在蘆荻社大我們重看井迎瑞所拍的紀錄片②，鏡頭掃過躺在卡車前的童工，他們紛紛躲進棉被，只有阿花昂然面對鏡頭前，雙手合掌、向著大門唸唸有詞；混亂中，也不知何時她將土地公請了出來，放在隊伍前方和世俗的力量對峙。

應該是黑道打了遲秉仁的時候，她終於憤怒了，還是失望了？也不清楚。但是那天，她在廚房裡發飆，員工趕緊找幹部去安撫，我抓了相機跟著到餐廳的時候，她已經摔了很多碗盤，開始點香膜拜供奉多年的、在牆上神龕裡的土地公，然後突然搬椅子墊腳，急促的拿下神像就往外衝，我們跟著她，幾乎用跑的，穿過幾棟廠房、宿舍、自救會辦公室、每分鐘走九十公尺的標語、升旗台、大門廣場、椰子樹，來到了吳火獅去世那天魚兒暴斃的荷花池③，天哪！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擔心她會跳進池塘，但是她沒有，她做了令人更震驚的事，她舉起手裡捧著的神像用力砸進池塘！

我真的被嚇著了，呆呆的看著丟完神像的她在地上打滾，徐凌雲安撫著她。回神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他媽的，綠色小組竟然沒拍到這個鏡頭。因為，一個人，要有多大的絕望和勇氣，才能把自己的信仰親手丟進水裡？

自救會的員工用竹竿將底座朝天的神像撈上岸，但阿花那天就收拾行李離開了工廠，再也沒有回來參加抗爭，據說她也沒有領資方的資遣費。這個震撼教育我一直忘不了，但並不清楚它的意義，現在寫著，才開始知道，那代表著一種提醒：永遠不要低估抗爭可能引發的衝擊，因為抗爭會讓平常被掩蓋的社會矛盾，赤裸裸的作用在敏感的當事人身④。

① 工人們傳播這些流言，但經常是語帶同情的傳播，也許可以稱之「善意的污名化」，用流言的方式，試圖替她辯解落到今日下場不是她的責任，而是有理可循。

② 2003/4/19由夏林清主持的「工人社群說故事」團體邀請新光老員工參與，井迎瑞在會中放映了當年拍攝、尚未剪接的記錄片毛帶，勾起了很多回憶。

③ 柳美回憶，某日上班，荷花池裡浮起很多魚肚翻白的死魚，正在議論，就傳來吳火獅的死訊。

④ 鄭村棋在2003年蘆荻社大聚會時也表示，丟神像事件讓他警覺到社會邊緣人有異於常人的敏感度，而特別容易被運動的所觸動。



法迫害的黨工為宗旨，【新潮流】的簡錫堦當時是會長，謝長廷系的林重謨是活動組長，這兩個當時最鮮明的群衆路線的團體都積極投入了新光抗爭。

【勞支會】由秘書長賴勁麟督導新手鄭文堂、邢寶珠夫婦負責蹲點，郭吉仁律師則是檯面人物⑩；【北基會】的主將是林重謨，傅雲貴和廖耀松是副手（三人都是徐凌雲的好友，所以比勞支會有更大的影響力）。如果再加上經常聲援的【台鐵員工聯誼會】會長、民進黨黨員楊錦章，和抗爭末期出現的【自主工聯】會長、【台獨聯盟】的曾茂興，以及後來加入【建國廣場】的草根作家曾心儀，可以發現新光戰役吸引了獨派裡的各方激進力量⑪。

獨派與左派的合作與差異

除了泛獨派外，主要外力還有鄭村棋代表的海外歸國新興左翼人士⑫，夏林清、我和王蘋是他的副手。我們在美國留學時，先後受到70年代參加保釣運動而滯美的台灣左翼知識份子，包括蔡建仁、林孝信等人影響，回台灣投入社會運動。兩組拍新光紀錄片的人馬：拍16mm的井迎瑞和我們是一起在美國被影響的「同學」；全程拍攝VHS紀錄帶的綠色小組成員——謝文生和劉長鑫，來自蔡建仁回台灣後啓蒙的左翼學運社團⑬。我們雖然都有「泛左」的血緣，但並未組織化，只靠交情在合作，也因為白色恐怖並未真正消除，我們無法公開表明身份，不過民進黨內的工運人士應該都知道，我們不是民進黨的同路人，因為我

們認定民進黨是小資產階級政黨，打破戒嚴體制時有進步性，但不是工人可以寄望的政黨。

不過這次參與抗爭的外力，都沒有把政治立場帶進抗爭，而以群衆的利益為考量⑭。關廠公告時，有預感的徐凌雲和楊大華、李重光、曾慶鐙等人，已經先到謝長廷服務處沙盤推演如何籌組自救會，而第一個被自救會通知到達士林廠的外力是【勞支會】的賴勁麟。從這點觀察，自救會領導的原始企圖就是透過徐凌雲來結盟民進黨的力量向資方施壓；而民進黨習慣於透過樁腳掌控群衆，北基會和勞支會一定認為，自救會的頭人是「自己人」，群衆必然在掌控中。抗爭初期的確如此，捐款、聲援的公職人員幾乎清一色來自民進黨，自救會也幾乎按照林重謨和徐凌雲的指揮行動，但是當抗爭受挫、徐凌雲無法處理群衆的疑慮、民進黨又若即若離時，自救會內部開始分化出不同的聲音。



沉思中的徐凌雲。

「衆叛親離」自救會召集人

按照員工自己的說法，自救會後來分為「主戰派」和「溫和派」。主戰的雞以會長徐凌雲、遲秉仁為代表，溫和的兔是李重光、曾慶鐙、陳明仁、柳美¹⁵等，當「雞同兔講」的時候，徐凌雲的好友、但相對較溫和的楊大華，就成為溝通者。溫和派不滿徐凌雲躁進的策略，但並沒有準備扛起決策的責任，只是階段性的結盟比較謹慎的外力鄭村棋，來制衡躁進的北基會。所以，在徐凌雲的世界裡，也許認為鄭村棋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扯他的後腿。直到12月初，資方一面下重手宣佈斷水斷電，一面以重開談判大門為餌，要求自救會公開道歉。溫和派主張「先禮後兵」、拆除布條換取談判機會；但徐凌雲主張「以戰逼和」、再度包圍台證。兩方僵持不下，最後經會員大會表決，徐凌雲案被否決，其實這迫使溫和派真正扛起分擔成敗的責任，也因此才有機會讓主談派面對被資方欺騙、而在幾天後更為激憤。但徐凌雲可能只覺得自己被架空，變得暴躁，不斷與其他幹部爭執。

在同一時期的某日，貼身指導徐凌雲抗爭的師父林重謨，突然把自救會的幹部找去工廠裡的花園，宣佈他必須淡出抗爭，因為新光集團威脅切斷給他太太的公司的訂單¹⁶。可以想見，「衆叛親離」一定是當時徐凌雲的心情，但是他硬撐著。

其實那年十月，鄭村棋找我一起去士林廠，第一

次看見徐凌雲時就覺得他「虛張聲勢」，他說話不只音量很大，口氣也超大。當過勞工記者的我，自以為見識了各種場面，又親身經歷了一場尖銳的中時工會抗爭，其實有點看他不順眼。

小心，他翻臉像翻書

自救會第一次到南京東路新光大樓抗議，我們正調度著隊伍，一個便衣把徐凌雲拉到旁邊去見穿夾克的長官，徐凌雲和他寒暄，他也像遇到老友一樣的擁抱拍打徐凌雲，講些常見面、互相啦、不要為難警方什麼的。徐和他握手後回到隊伍，小聲的對我和楊大華說：「那個人是刑事組組長侯友宜，小心，他翻臉像翻書」，我們回頭望，剛才那個兒不高、臉很大的長官已經完全收起了笑容，雙手叉在胸前，眼露凶光的瞪著群衆。

第二次接觸到這令人印象深刻的目的一是平安夜的中午，蔡建仁被強固保全拖進大樓毆打，我企圖衝進去，但一排穿制服的警察擋住我，站在中央的就是雙手抱胸的侯友宜。我被保全邊辱罵邊拖開，他鄙視的瞪著、一語不發，遠處是女工的哭聲和徐凌雲沙啞的抗議。兩年後，侯友宜偵破吳東亮被胡關寶綁架案；約十年後，陳進興綁架案轟動全台，侯友宜被陳進興指定為談判對象，SNG轉播他戴鋼盔、穿防彈背心，從屋裡接下一個被當人質的小baby；2003年初，民進黨舉辦警官入黨儀式，媒體報導侯友宜在最後一刻婉拒入黨。我想，堅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的侯友宜，這兩個時刻絕不記得1988年曾經毫不留情的鎮壓女工；他也一定不曾想過，自己和一個工人精神崩潰有任何關連。

營養不良的草根組織者

民進黨靠反國民黨和台灣人意識來動員，慣用的組織手法是公職人員登高一呼、群眾響應的由上而下

代理人模式；對於由下而上的草根組織模式其實相當陌生。尤其主張群衆路線的「雞派」，連選舉的經驗都不足，更不用說組織非政治化的工人群衆了。【新潮流】在87年出版邱義仁親自翻譯的《組織人民爭取權利 Organizing People for Rights》手冊（菲律賓組織者原著），證明當時缺乏本土經驗，企圖藉用國外資源的窘境。「雞派」還透過與長老教會的【城鄉宣道會（URM）】的國際網絡來培養樁腳，通常知識分子菁英、社團領袖被優先推薦參加國內URM課程，之後再前往美國的聖地牙哥大學附設的人力資源中心去短期深造。小企業主林重謨就是早期留美的學員，在新光抗爭前，他曾協助北縣某大樓居民抗爭，新光可能是第二個習作¹⁷。

徐凌雲是工人，又沒有掌握工會¹⁸，還沒有輪到他參加領袖訓練，就遇到關廠抗爭，被逼上了領導的位子。他只有按照自己過去被民進黨領導的經驗來土法煉鋼，因此模仿公職人員的霸氣，效果粗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理解，是十幾年後自己體會什麼叫做組織工作，並回頭來檢視歷史才能發現的。當時我帶著知識份子的驕氣，根本不考慮他身為工人的社會條件，暗地裡看輕他；其實他是比我資深的政治人，反過來敵視我這個騎到他頭上的歸國學人、速成的半吊子工運外力，反而是正當的。

徐凌雲、林重謨的小圈圈和鄭村棋的確有緊張關係，但那根本不是雞兔之別¹⁹。回顧關廠後的歷史發

展，鄭村棋絕對是比【北基會】更好鬥的雞。兩者的差異在於組織工人的態度：鄭村棋在乎基層群衆的自發力量，但【北基會】注重頭人的掌握（我相信即使林重謨也沒有能力細膩的組織、教育像新光這樣被隔絕於政治生活之外的工人）。獨派將徐凌雲視為自救會的頭人，但卻沒有提供他作為領導的條件，甚至沒有支援貼身的幕僚²⁰。結果鄭村棋邀我和王蘋駐廠蹲點，勞支會才加派鄭文堂、邢寶珠跟著進駐。後來是鄭村棋帶著我們四人替徐凌雲、林重謨組訓幹部、教育群衆，鞏固他們的下盤。但獨派似乎並不領情，或不了解組織群衆有多困難。自救會幹部後來說，林重謨當著【北基會】「小圈圈」指責徐凌雲：「那攏抓毋著（怎麼都掌控不了）？」

使工人錯估情勢的勞支會和北基會

不知道徐凌雲給自己多大的壓力，他一直期待民進黨會投入人力物力，來協助自救會打敗大財團；他也認為自救會的抗爭，是回報民進黨，因為對抗鴻霸財團和國民黨，當然是反對運動的一環；甚至也許他有某種翻身作主的感覺，因為他從抬轎者，變成了可以將麥克風遞給公職人員的領導者；以前他只能在舞台下，現在他不但在舞台上，還把群衆帶出工廠，替民進黨創造舞台。抗爭的那兩個月，應該是他投入政治運動生涯裡最燦爛的時光。

但新光抗爭恰好發生在政治力上升、社運力下降

的特殊階段。88年520事件前，民進黨在擴張，又同時看到社會運動力量上升，所以工具性的投入社運，企圖利用社運進一步壯大反對黨的力量²¹；但520事件使民進黨發現群眾難以駕馭、而開始對群眾運動與社運保持距離，當年下半年幾乎沒有群眾活動，年底包圍立法院的行動幾次中途喊停²²。



1995年洪奇昌參加勞陣舉辦的反金權遊行，這是民進黨最後一次大舉出動參加工運集會。

民進黨與工運也正處於一個很隱晦的分流階段。自主工運在86年開始胎動，當然是受益於政治民主化，並向反對黨吸取經驗，87年第一波年終獎金風潮後自主工會大量誕生，年底民進黨的王義雄脫黨籌組【工黨】，這應該是民進黨擺脫階級政黨、走向所謂「全民政黨」的起點²³。88年春節的第二波年終獎金風潮時，工運已具規模，累積到5/1火車罷駛算達到頂點；八月苗客罷駛是挫敗的序幕，接著九月中時工會被打壓、鎮暴警察包圍台鐵大會、十月新光關廠、十一月曾茂興遭解雇等，都顯示了資方反撲和國家整

工黨落井下石

聲援新光抗爭的外力，只有【工黨】破壞了自救會的主體性，將工人意外的捲入一場工運的雞兔鬥爭。工黨在88年五月分裂，分裂的性質和民進黨的雞兔論戰很類似，前民進黨立委王義雄所主導的——選舉、公職、勞資談判路線留在工黨；夏潮系和新興工會幹部的組合——發展群眾、組織工會和抗爭路線的激進力量分裂出去，另組【勞動黨】。【勞動黨】在1988/12/31成立，新光抗爭時忙於籌備建黨，無暇聲援。

但是【工黨】為了凸顯它溫和政黨的形象，在各種勞資爭議裡積極扮演和事佬、搓圓子湯的角色，分裂後更加積極，新光抗爭也不例外。當資方為了分化抗爭，推出所謂優惠方案時，在新光集團關係企業新海瓦斯任職，也是工會常務理事及工黨中常委的侯晴耀，透過【工黨】派來聲援抗爭的組織部幹事王娟萍，積極說服女工背著自救會，私下與資方達成協議、脫離抗爭。當自救會發現時，公開批判王娟萍，脫隊的女工跳出來為她辯護，造成自救會士氣重挫。

【工黨】的機關報《工報》，在88年12月黨週年特刊中，更刊載了一篇署名「新光紡織士林廠女工」、標題為〈工黨要誠懇理性〉的短文：

工黨才剛成立，我還不太了解，只聽人說好像以前發生過分裂的事，不太清楚。但我希望工黨要很誠懇、理性的來幫助勞工，而不是採用暴力的方式，就像這次新光的事一樣，一些帶頭的人好像要把我們帶到「一直鬥下去，把老闆拉下來」的情況，一直到現在，抗議四十三天，一直都沒結果。

這篇文章應該不是資方指使所寫，但卻從工運內部呼應了資方在媒體抹黑自救會的說法，對抗爭中的自救會當然是進一步落井下石，也證明【工黨】將工人當作宣傳的工具。

肅的來臨。民進黨沒有因為工運走入低潮而更靠近弱勢勞方，它冷眼旁觀【工黨】和【勞動黨】的分裂，偶而有工人選票流失的焦慮，但基本上看衰工人力，愈來愈確立「全民政黨」的路線²⁴。

作為民進黨草創黨員（卻與工運疏離）的徐凌雲，一定沒有警覺到民進黨在520後的降溫政策，更沒意識到工運已被孤立。他可能沈浸在民進黨力量上升的氣氛中，相信以民進黨為中心、推倒各種特權的機會即將來到。上升的民進黨使徐凌雲對抗爭戰果的期待拉的更高，但實質的工運力量下降，卻使他的落空摔的更重，這是撕裂他精神的主因嗎？

徐凌雲最後的失落感，與其說是對民進黨的失望，更應該說是勞支會和北基會帶來的迷惑。民進黨的主流（如美麗島系）擺明了對工運沒興趣、自始至終都把這場勞資爭議放在邊緣，然而民進黨內的【新潮流】和【北基會】之類的次團體，卻發揮了混淆作用。簡錫堦、林重謨、郭吉仁等人物，認真的和工人站在一起，使工人以為民進黨像他們一樣的可靠，最後卻因為寄望太高而失望。

沒有等到新國家的新光工人

我認為到了（平安夜前一天的）假媽媽事件後，徐凌雲察覺對手已經不是「資方」，而是代表「國家」的情治單位²⁵，但唯一能和「國家」對打的民進黨，

看起來也不會出手幫忙了。猜想他把抗爭的目標降低為「不要輸的太難看」，但是次日，蔡建仁未經預告的挑釁而當眾被打，暴露了自救會沒有任何反撲的餘力，徐凌雲歇斯底里幾乎昏厥，遲秉仁送他就醫，診斷出心律不整，我們通知他的妻兒，把他安置到南京東路的賓館休息。

決策核心也終於面臨抉擇，外力和自救會幹部在新光大樓後方的伊通公園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辯論是否要撤離大樓，自救會幹部李重光、楊大華等和郭吉仁主張撤離，鄭文堂主張堅守，我則在撤離與留守之間搖擺投機，最後鄭村棋以轉進為巡迴全台工運列車的替代方案，說服了大家在平安夜晚會後撤離。

平安夜晚會是開始埋鍋造飯時就決定的，原本是想藉晚會發動外力總動員，作為抗爭的高潮；另一個原因是當晚民進黨內激進台獨力量，在士林廠旁邊的廢河道舉辦【新國家之夜】，預估動員萬人，自救會希望能夠援引新國家的群眾力量。林重謨、楊錦章事前告訴徐凌雲，大會將宣佈新光自救會在夜宿總公司，呼籲群眾散會後到南京東路聲援。

但是當晚真正到南京東路和工人共渡平安夜的，仍是【勞支會】和【勞動黨】等有限的工運幹部，和從烏來大會齊體下山聲援的【自主工聯】。強固保全的氣氛更囂張了，帶著伸縮電擊棒衝進現場抓人，破壞晚會營造的平靜氣氛。主持人楊大華刻意拖延晚會

煽風點火的啓蒙者

1988年11/12全國工人第一次舉辦大遊行，一方面是展現實力，另一方面卻是工運潛在的尋求自保的需要。大部分的工人只感覺到前者，因為民進黨的擴張，使部份工運人士產生錯覺，以為工人群衆像政治群衆一樣，期待革命、著手變天。當這種亢奮的心理，遇到現實運動的挫折時，變得更焦躁，而企圖奮力一搏，寄望引爆衝突後群眾會跟著揭竿而起。我的運動上啓蒙導師——蔡建仁，在新光抗爭平安夜中午的挑釁動作就是代表作，或者像曾茂興全台煽風點火搞罷工的企圖。

但事實上，工人根本沒有反抗的準備，也沒有太多知識份子和運動者有耐心蹲下去協助工人做準備，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從中時工會受挫，到新光案再度受挫，轉進到自主工聯，又在遠化案受挫，當時仍激情意識形態掛帥的我，覺得沒有抗爭就是沒戰場了，抗拒寂寞難耐的組織工作，拒絕了鄭村棋和夏林清下基層的邀請，縮回去當《財訊》記者了。

結束的時間，苦苦等待新國家之夜的群眾前來聲援，徐凌雲在現場焦慮的踱步，不時打電話詢問新國家之夜結束了沒有。好不容易，等到了從廢河道趕來的傅雲貴等幾個熟面孔，我記得幹部不斷問他，聲援的人還要多久才到？傅雲貴的回答愈來愈尷尬，最後的確來了個位數的群衆，和個位數的宣傳車，其中，包括楊錦章。他也許不知道他的哥們徐凌雲出了狀況，他聽到自救會決定撤離時，破口大罵幹部沒膽，那時，徐凌雲「不要輸的太難看」的最後願望也落空了。

平安夜，他騎在獅子身上

燭光中，長老教會的牧師陪我們唱完平安夜，天空開始飄起細雨，我們整隊走路前往溫州街。自救會改裝的小發財，負責載運埋鍋灶飯的器材，和幾十人夜宿的棉被，堆的滿滿的，邊開、邊滾落東西，顯得格外淒涼。



自救會改裝的簡陋宣傳車，夜宿時停在總公司外。

殿後的發財車開走後，我和鄭村棋為確定人員全數安全撤離，又開車回到騎樓下巡視，卻發現徐凌雲沒有撤退，他穿著抗爭白袍，騎在新光大樓正門的銅獅上，銅獅雙眼被工人噴了白漆，但徐凌雲的眼睛更亮。我們接近他，他卻突然站起來，雙腳立在獅頭上，搖搖晃晃的，邊踐踏著獅頭、邊嘶喊著抗議新光集團的口號，南京東路偶而駛過的汽車，照亮了他的身影，背後是不久前保全、警察聚集的大廳，那時卻

出奇的昏暗與安靜。鄭試圖安慰他，說我們會再回來之類的，不久他終於蹲下來，搥打著獅子的頭，泣不成聲的唸著「鄭村棋，我們不該撤退，我們要戰下去、戰下去！」，鄭勸他回旅館休息，他卻又衝到行人道上，抬頭對新光大樓繼續嘶喊，細雨飄過路燈淋在他身上，鄭只好請他兒子架他回賓館，並叮嚀著要看好他爸爸。

追趕走向長老教會的隊伍途中，我探詢鄭對徐凌雲狀況的看法，他說：休息幾天也許會好吧。語氣非常的不確定，充滿了憂慮。

徐凌雲就此消失了

再看到徐凌雲已經是平安夜後好幾天了，楊大華被迫淡出自救會（見附欄：楊大華的鞋子不見了），其他會員在義光教會，早晚唱著聖歌。有一天，徐凌

雲夫妻和兒子來到義光教會，那是第一次看見徐凌雲穿西裝，他除了打招呼外幾乎沒有說什麼話，從頭到尾靜靜的。他太太避著他，私下和幹部解釋他的病情，醫生說要長期療養，不能受到刺激等等。

當時我正在替每個撤退到義光的成員拍紀念照，其他人幾乎都拍到了，只缺沒有隨隊撤退的徐凌雲，於是邀請他們拍全家福。他太太拒絕了，徐凌雲拉著兒子，在義光教會門口讓我拍照，他順從的微笑，鏡頭裡就像是上教堂做禮拜的順民，那個我所認識的——平常刁著煙、穿夾克、講話張牙舞爪的自救會會長——徐凌雲，才經過幾天就已經消失不見了。

未完成的馴服獅子的願望

那幾天裡，12/28台北舉辦了近萬人的「還我客家話」大遊行——解嚴後第一場也是唯一的客家人政治遊行，客家人反對運動者徐凌雲，因為必須在家吞

楊大華的鞋子不見了

自救會轉進到溫馨的義光教會，鄭村棋的盤算是先療傷止痛，至少維持一個集體的結尾，留下發展的可能性。但就像教會的歷史其實並不平靜，資方也不打算讓自救會善終。總公司派主管到楊大華家威脅（註），要求楊退出自救會，並強迫他太太簽收了楊大華的資遣費。楊大華失蹤了幾天，最後他選擇回到教會面對大家。那是一場痛苦的會議，不論他說起什麼壓力，總有人提出解決方案，會議結束時，故意對他的去留不作決議。當他要離開教會時，發生了有趣的事：他脫在門口的鞋子不見了！李重光發動會員，從一樓找到地下室，就是找不到，楊大華的一雙鞋子就在上帝面前消失了！

我已經忘了那天他是不是打赤腳回家的。教會的玄關在室內，鞋子不可能被偷走，還有，誰敢在教堂犯十誡？事後我們推測，應該是那些支持他的中高齡歐基桑、歐巴桑，為了阻止他離開自救會，想出把鞋子藏起來的可愛撇步，反正上帝不是台灣人的神，冤枉啦！

註：楊大華的哥哥以承包新光公司的小型木作裝修為職業，自救會夜宿總公司後，公司主管以他哥哥為「人質」，威脅楊大華，如果不退出自救會，將停止發包給他哥哥。



徐凌雲和兒子的合影。

服某些有效的藥丸，錯過了盛會。如果平安夜前的徐凌雲還在，接下來更為激情的政治運動：89年鄭南榕、詹益樺自焚；90年三月學運、反軍人干政；91年反閱兵，92年416要求總統直選靜坐……有足夠的威力觸動他體內的引信嗎？

民進黨在89年、92年、93年幾場選舉中得票率大幅提高，94年阿扁當選市長，首都變天的效應使民進黨拋棄群眾路線，徹底走向選舉政黨。靠向「主流價值」的新當權者，開始嫌棄曾經充當火牛的群眾，真得笨的像牛、不知務實。94年群眾之聲、建國廣場的

地下電台風潮，是激進群眾對喪失理想的民進黨的最後一怒，之後幾乎沒有集體反彈的力量。

我確定楊大華和傅雲貴沒有錯過鄭南榕的喪禮，應該也看到了詹益樺的自焚，如果徐凌雲和他們走在一起，他會像傅雲貴、曾心儀一樣繼續當雞，一路走進建國廣場批判民進黨，然後帶著挫敗、為生活抑鬱奔波？或者像張照碧、許守活、江清通，至少用工運取代政治、延續了理想主義的信仰？或是「從善如流」，等到兩千年阿扁當選總統，一躍成為新御用工運人士？

2003年四月，一名自稱民進黨欠他輔選經費兩百萬的台東民衆林文川，在阿扁參加中常會時，攜帶土製汽油彈前往民進黨樓下縱火，媒體以一句輕描淡寫的「精神異常」論斷了他的行為。同年五月貨車司機吳桂慶抗議交通政策，駕車自殺攻擊交通部；不久民進黨激進黨工陳東騰，為提醒黨內同志勿忘詹益樺自焚，於立委周慧瑛北投住宅後院上吊自殺。我又想起徐凌雲，如果不是他的家庭辛苦的承受了平安夜之後的徐凌雲，他會變成林文川、陳東騰、吳桂慶嗎？

如果沒有新光抗爭，徐凌雲將經歷一場場選戰的勝利，卻同時是理想的節節敗退，這樣慢性的、而不是一次劇烈的急性面對信仰價值的破滅，就能避免引爆體內的炸彈嗎？幸運保持「正常的」他，和曾經燦爛兩個月卻爆裂的他，我們能確定何者比較幸運嗎？

他留下這麼多的謎，每一個都考驗著工運的核心信念，沒有疑惑就沒有解答，這是他的故事不能缺席的原因。

- ① 2003年4/19蘆荻社大參加工人社群講故事團體後，曾慶鐘在李重光家聚餐時所回憶。
- ② 關廠前，鄭南榕發行的時代雜誌是他們必讀的黨外刊物，如果楊大華買了，徐凌雲就看他的，反之亦然。
- ③ 楊大華個性謹慎個性，他當時雖然是反對運動的熱心觀察者，但很少實際參加街頭運動，只有在選舉時幫助謝長廷發文宣。
- ④ 謝長廷當時是民進黨社會運動部總督導，負責發展群眾運動。
- ⑤ 見王振寰〈台灣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四期，1993年3月。
- ⑥ 詹益樺，86年投身黨外運動，最崇拜邱義仁和蔡有全，因此南下高雄六龜企圖組織農民，五二〇事件他拆下立法院招牌，鄭南榕出殯時自焚。1993/5/19北基會舉辦詹益樺逝世三週年紀念會，並出版小手冊《痕跡：一個草根工作者的生與死》。施明德當時是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 ⑦ 勞支會成立時由新潮流主導，但結盟了編聯會內左翼的夏潮系人馬；88年夏潮將力量轉往工黨，新潮流在勞支會取得支配性的主導權。
- ⑧ 台北市議員陳水扁在當時被新潮流封為典型的雞——清流、不包工程，以反對運動為職志。同為黨外陣營的王昆則代表兔——反對國民黨，但和國民黨議員一樣包工程。王昆和之女王雪峰當年以剛畢業之學運份子身份，

到工廠聲援新光抗爭。

- ⑨ 《新潮流》雜誌於1984年6月創刊，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於87年11月成立。
- ⑩ 郭吉仁是勞支會的創會律師，新光案時擔任自主工聯執行長，但組織歸屬應算是親勞支會。
- ⑪ 這幾股力量也有錯綜的重疊，傅雲貴也是勞支會的會員；曾茂興當時正被台獨聯盟和新潮流兩方拉攏中；曾心儀和鄭文堂兩人都是北基會第一屆的管理委員，而徐凌雲當時剛接第二屆的管理委員。
- ⑫ 當時工運另一股左翼力量是主張兩岸統一的夏潮系，該系參與工黨建黨又退出，新光抗爭時，他們忙於籌備勞動黨，所以無暇聲援。勞動黨希望蔡建仁、鄭村棋等人「歸隊」，但因為對勞動黨階段性的任務和統一立場有不同意見，自美歸國的左翼人士並未加入勞動黨；也因為內部差異，無法自行組成政治性團體。
- ⑬ 這些社團89年組成「民學聯」，在90年三月學運時，成為主要領導力量之一。
- ⑭ 這也是我們與獨派合作最密切的抗爭，一方面傅雲貴雖然明知我們政治選擇不同，但因為我們當記者時經常報導大同工會抗爭，所以他對我們相當信任；而勞支會的鄭文堂夫婦是文藝浪漫派，與後來的某些充滿權謀和小動作的新潮流組織者非常不同。可惜的是，多數理想主義及正直的工作者都離開了工運和勞支會（勞工陣線），使良性的競爭幾乎成為絕響。
- ⑮ 記憶裡自救會的女性幹部參與了和、戰立場的激辯，但印象模糊；也因為她們沒有成為領導者，而無法根據書寫的資料來回憶，這也反映了女性容易在歷史裡被消音的遺憾。
- ⑯ 林重謨的太太在五分埔開設成衣公司，新光集團是主要

業務來源之一。林重謨的退出，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民進黨為何無法真正相挺工運的現實，因為他們與資方的利益難以切割。

⑯URM訓練以「非暴力抗爭」為主，但這種舶來品的社運理論，後來只有簡錫堦和林義雄將之深化，其他人的操作都相當粗糙。

⑰徐凌雲在廠內被資方歸屬於「頑劣」份子，在生產線上也沒有領導統御的經歷。關廠前，他曾擔任過兩屆常務理事，但因為理事會被主管把持，也可能他更熱衷政治，徐凌雲並沒有作為。

⑲另一個差別來自工人口中，一位自救會幹部在2002年北市勞教中心舉辦的「沒落產業勞工口述歷史」座談會上說：「那時候林重謨的方式是鼓勵我們往前衝，他在後面。他的講法是說，他們已經有底，如果被抓的話會被關。但是鄭村棋跟吳永毅不一樣，帶著我們往前衝，所以當初也有很多閒言閒語說鄭村棋要參加什麼市議員、立法委員，結果現在剛好是相反。」不知這是否是林重謨當初激勵員工的策略，但因為他後來脫隊，使工人應證了對他的不信任。

⑳北基會的徐凌雲、林重謨、傅雲貴、廖耀松，常常開非正式的會議，對自救會的決策提出檢討。

㉑1987年群眾運動高達一千六百件。民進黨視社運為工具的關係，見吳介民著〈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載於《台灣社會學》第四期，頁159-198，2002/9/27出版。

㉒鄭南榕在89年四月因拒捕自焚，但也隱含了抗議黨內妥協路線的意味。不過他的自焚正好是激進路線的終結而不是開始。意識形態掛帥的鄭南榕，令務實路線的黨內主流芒刺在背，自焚恰好使各派系都鬆了一口氣，因為

他沒有實質地盤、影響力很快消散。90年民進黨因郝柏村上台，被迫再發動群眾運動，但除反核外，幾乎都是政治運動。

㉓「全民政黨」就是以小資產階級利益為主，但包裝為全民利益的政黨，主要目的是既可以爭取佔多數人口的工人選票，又防止工人成為政治的重心。

㉔艾琳達認為民進黨在90年代，因美麗島系取得領導權，從民粹主義政黨變成「資產階級化」政黨。但從工運角度觀察，美麗島系從黨外時代就是資產階級化的，反而是主張群眾路線的新潮流，在90年代逐漸放棄群眾路線，才使民進黨宣告徹底資產階級化。

㉕鄭村棋表示，12/18自救會在議會圍堵大陸留學生，當時市公車處的另一批陳情者向大陸學生下跪，但【聯合報】卻故意抹黑新光工人下跪，他認為那是情治單位介入的指標。

編按：1991年，我們與戰友團回憶整理抗爭經驗時，仍然沒有條件去反省民進黨的角色。經過這十幾年，民進黨逐漸成為統治者，更多支持民進黨的基層勞動者終於覺悟，才有機會談論民進黨在工運歷史裡的角色。

後記：叫「悲劇英雄」太沈重

寫徐凌雲的稿件逼近截稿底限前才完成，匆匆交給李重光、楊大華、曾慶鐙，希望他們初步校訂審閱，他們也分別做了回應。但由於截稿壓力無法再改主文，只好以此簡短後記補充。

李重光和曾慶鐙都表示，當年沒有考慮太多，只是單純、天真想要援引外力來幫助自救會，包括民進黨。抗爭開始和結束後，才慢慢觀察、思考外力不同的做法。其實剛開始來的外力不是政黨，而是大同工會的傅雲貴，和陳萩蓉（李重光的太太）因養狗而認識的桃勤工會余吉政，在李重光家密集談了兩三次，才約到謝長廷服務處找林重謨諮詢。

楊大華則認為，本文的確如實交代了當年的歷史時空（註），他以一句話呼應：「徐凌雲不是被資方打敗的，而是被組織成員和外力打敗的，他也是受害者。」不過，他認為本文雖呈現了徐凌雲政治人的面貌，但是對徐的工人身份描寫的不夠充分，是個缺憾。楊大華強調，應該去認識關廠前的徐凌雲，在工廠年資十五年，比政治生命更長，堅持工人自主性上，他有執著的一面，所以資方關廠時他跳出來領導自救會。而且自救會由各部門直接推選談判代表，有完整性和代表性，不是個人可以主導。徐也協調各方

外力為自救會所用，並未排斥來自非民進黨的外力。楊大華擔心本文詳實的介紹政治背景，會使讀者誤以為徐純屬政黨動機，雖然還原了悲劇英雄的定位，反而有損工人自主抗爭的意義。

他所謂「被組織成員打敗」，是指徐在抗爭目標落空後，無法面對內部的工人，也是造成他崩潰的主要原因。他舉例替徐凌雲辯護：自救會在抗爭中期接納了原先猶豫不決、沒有參加抗爭的主管黃傅哲，讓他參與草擬解決方案；徐也和溫和的陳明仁合作愉快，表示徐並非一意孤行的主戰。徐自己也積極參與研擬解決方案，為不同成員、包括計件工的利益設想，草案還請勞支會的賴勁麟來看過，所以徐不是為戰而戰。

我同意楊大華的憂慮，雖然本文沒有任何批判徐凌雲的意圖，反而肯定他是稱職的自救會召集人（我也沒有否定主和派的意圖，因為戰和對於集體行動本來就是不可切割的銅板兩面，兩者的關係恐怕必須用主文同樣篇幅才能說清楚）；本文假設徐凌雲的工人／政治人雙重身份使他承受了比一般工人領導者更大的壓力；也使他用更高的標準衡量抗爭目標。為此將他放入政治歷史，進行同理心的分析，因主題有所偏重，的確可能誤導讀者，特此提醒。

註：楊大華感慨的提起他和詹益樺的意外交集。抗爭結束後某月，他有事打電話找建教生秋月，秋月等人當時在鄭文堂的安排下，借住在木柵某新潮流椿腳的家裡，電話恰好是去串門子的詹益樺接的，楊大華和他聊了幾句，幾個月後詹益樺就自焚了。



在總公司大樓門口的徐凌雲。

一唱改寫工運史

陳柏偉



我在1997年書寫碩士論文❶的時候，從工委會組織者手中拿到了1988年新光紡織士林廠抗爭的歌詞傳單和錄音帶❷。按下播放鍵，原住民建教合作生的嗓音從喇叭中流洩出來，我的書寫過程也因時空交錯而不時停頓；讀著新光工人改編的歌詞，聽著歌曲，我彷彿置身在新光抗爭的時空：坐在地上，彈著吉他和建教生、歐巴桑、歐吉桑們一起唱歌跳舞。

當年參與協助新光工人抗爭的鄭村棋、吳永毅和王蘋等人，發現集會現場的冗長演說與千篇一律的口號，造成群體中相對弱勢者參與上的困難，便鼓勵那些原本就愛唱歌的建教生們，把改編歌曲拿到集會現場一起唱❸。就因為這群十、七八歲原住民的一唱，不但讓這場抗爭充滿了歌聲，更改寫了日後工運集體行動的面貌。

當年唱歌不只讓苦悶有了出口，建教生也在唱歌的過程裡，在集體裡找到了新位子。不擅言詞的原住民，發覺「用唱的比較大聲」：原本她們在演說與勞教場合只能在最後頭起鬨，評論「鄭老師額頭上那個黑點是蒼蠅還是痣？」現在他們可以站在最前頭，用最嘹亮動人的歌聲鼓舞士氣。

唱歌除了凝聚內部、對外宣傳，更深刻的效果是

唱者因為歌詞的內容而開始思考。97年我訪談建教生憶泡，她說：「我邊唱會邊想，我們被資遣後去外面工廠，也會遇到像歌詞裡面寫的被欺壓的狀況嗎？」同時，建教生們也透過歌曲和工廠中更弱勢的歐巴桑女工建立連結，在組織者的建議下，她們嘗試和歐巴桑一起討論歌詞，改編中年女工們熟悉的台語歌曲❹。經由這個過程，歐巴桑們被鼓勵唱出她們多年來對工廠的感情、以及與老闆之間的愛恨情仇。

組織者更引進了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和中時工會的勞工楊俊華❺，一起到工廠和工人改編歌曲、創作歌詞，加入了工運的社群感，讓所有參與者在共同書寫歌詞的過程中，引發了各種的討論。而不同群體和世代（漢人、原住民、建教生、中年女工、工運組織者）藉由這個過程，進入了各別不同的生命故事中。

新光抗爭「一起唱歌」（更精確地說「一起唱出集體創作、改編的歌曲」）的強烈效果，成了往後抗爭必學的「撇步」。包括92年基客罷工、93年嘉隆關廠、96年福昌、聯福、東菱、東洋等關廠，98年公娼反廢娼…等等都有抗爭歌曲的形式；也因此，工委會在96年組織了「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除了傳承、紀錄抗爭個案裡的「唱歌」外，希望進一步能夠

創作整體勞動者的歌曲，於是誕生了〈福氣個屁！〉等歌曲，藉由歌聲，讓社會認識抗爭中的工人與底層弱勢者的處境。

新光士林廠抗爭的貢獻之一，就是證明「集體參與」的文化形式是運動的寶物、是「培力（empowerment）」的過程，它讓手無寸鐵（筆）的人們得以發聲、受到激勵，強壯了被踐踏、被污名化的生命。



福昌紡織女工在1996年的晚會唱自己改編的歌。

編按：本文作者陳柏偉是【黑手那卡西】的團長，該合唱團由工會幹部、工人家屬和工運組織者組成，曾出版《福氣個屁！》、《台灣牛》等專輯，並且成為工運、妓權、反核、農運、教師、反戰等遊行中主要表演團體之一。上圖為女工在福昌關廠抗爭晚會唱自編歌曲，陳柏偉為協助之外力。

- ① 台大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唱工人的歌—台灣自主工運抗爭歌曲與抗爭空間的形構》，1998
- ② 新光自救會合唱團在民歌手邱晨的協助下，進錄音室錄製了一捲抗爭歌曲專輯，收錄了抗爭第一階段的歌曲。自救會並請錄音工廠製作了一千捲卡帶，在士林夜市、1112遊行、及民進黨的大型活動義賣，作為抗爭經費。
- ③ 第一批改編的歌曲其實是當時即將入伍，愛唱歌的年輕漢人男工邱朝仁，他在回台東報到前，在吳永毅要求改歌之後，改編了幾條歌向好友建教生們道別。除王秋月、吳秋英、林理惠等建教生外，胡美花、胡秀英、楊大華、廖秋碧、張綉雲、賴秋雲也參與了創作。
- ④ 包括柳美、劉寶蓮等。
- ⑤ 莫那能創作了輕快的〈我們是新光勞工〉，是自主工運第一首創作歌曲。楊俊華在抗爭後期改編了當時進入流行排行榜的〈鬥魚〉，可惜因抗爭告一段落，而未能唱紅。其他曾參與創作的外力，還包括綠色小組謝文生、劉長鑫，勞支會鄭文堂、邢寶珠。

挪用主流文化的實驗

吳永毅

老闆你的良心在那裡

說什麼，新光好，永遠是尚讚，說什麼，你永遠，要來照顧阮，原來你是沒血黑心，達到目的作你去，啊……
吳老闆，啊……我問你，你的良心，到底在那裡？

這次參與新光士林廠員工抗議資方非法停工的經驗，是極為可貴的，有關勞工如何在抗爭中塑造勞工文化的感想，和大家分享。

正如衆所週知，士林廠勞工抗爭的特色是：他們抗爭的形式擺脫了街頭運動的傳統模式。過去勞工缺乏自己的文化，所以抗爭時也只有繼承政治運動的形式，通常是以明星演說和呼口號的方式來完成抗爭的過程。但是這次新光工人推出了即興抗爭歌舞；這些歌舞對外的確發揮了傳播訊息、製造壓力和軟化第三者敵對態度的功能，而且用歌舞明顯的能宣洩勞方對資方不滿的情緒。這樣的抗爭不是只有少數領導幹部用擴音器演說，替群衆宣洩情緒，而是一種集體的表達和參與。

更有趣的是，這次抗爭中常常齊唱的十幾首歌曲中，八成以上是從原來被視為消沉的、浪漫的流行情歌改編的；原先表達男女之間哀怨的情緒，竟然和勞方對資方的怨恨相當一致。對於如何打破目前勞工找

不到自己的文化的困境，這次經驗似乎提供了一些出路。我們發現，雖然社會上一切有關音樂的資源，都是由文化商人掌握的，但是這些商人出售的歌曲中，仍表達了許多被壓迫和壓迫的關係(例如男與女的感情上的優勝劣敗等)，勞工應該把他們佔用下來，轉換成發揮積極作用的抗爭工具。

不但在音樂上要如此，在其他一切文化領域上也要進行抗爭中的借用運動，工人文化才有出路。新光士林廠建教生把紗的動作編成DISCO工作舞，就是立刻把DISCO從地下舞廳搶救出來，變成勞工生活上新的表達的工具。

為了佔用那些控制勞工做奴的各種資源，我們先要看穿一切現有的音樂、戲劇、舞蹈、文字、服裝、遊戲、圖畫的真面目；他們現在只是情歌、只是賺人眼淚的連續劇、只是歌星的禮服，是因為他們只被一種用途佔用了，所被束縛在單一的形式下。

其實他們都是社會共同的資產，我們勞工有權也有義務去佔領這些領域，讓我們和這些文化活動一起從資本家的欺騙下解脫出來。

(本文摘錄自《勞動者》1988.12.15)